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 ——基于浙江省G村的案例分析

陈 蕾 姚兆余

[摘 要]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浙江省象县G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作为案例,引入嵌入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该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和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村集体经济受到三重结构性力量的嵌入作用,即通过市场嵌入的形式,建立了公司制的市场经营模式;通过关系嵌入的形式,激发了社会资本的力量;通过组织嵌入的形式,确立了村集体统筹的组织地位。嵌入性发展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农村经营模式改革、熟人社会中互助精神以及基层治理权威效应。因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协调集体经济“市场—社区”双重属性中的内在张力并构建起多重联结机制。

[关键词] 嵌入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实践机制; 社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措施,更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2021年和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进一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指明了方向,指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既要探索多样化发展途径,又要建立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确权确股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化的发展路径进一步释放生产要素活力,发挥经济性职能,这对于在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中加强集体“统”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夏柱智, 2021)。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学界对如何统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论述。一是,探讨集体产权结构与市场机制的适配性问题。这一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信息平台建设背景下农地流转治理结构选择与纠纷化解研究”(72103095)。

[作者简介] 陈 蕾,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姚兆余,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通讯作者。

视角立足于制度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以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为依据,分析了集体产权与市场化机制衔接不畅的问题,认为具体运行中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因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深化集体产权改革。一方面,改革原先封闭的产权结构,建设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培育具有现代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和农民享有股东权利,强调“政经分离”“村企分工”(张绘,李尚,2023;曾恒源,高强,2023)。二是,从事实层面分析了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村集体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方面研究基于各地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村庄结构的差异,认为“政经分离”在当下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村庄,市场化改革应当依靠村集体的统筹引领作用(周立等,2021;王阳,吴蓉,2021)。其中,有学者根据集体经济的发展主体,提出了党组织领办、跨村组联合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三种类型(江宇,2022;杨力超,张冠李,2023),分别分析了村集体组织在其中承担的多样化角色和功能。

上述研究中,前者认为应以市场作为统筹发展的主体,以完善的产权规则制约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外来资本投资的信心,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治理风险的改革目标,增加经济效益(王德刚,孙平,2021;张克俊,付宗平,2022);后者则基于实践经验认为“政经合一”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村集体资产,村“两委”的统筹利于激活村庄自主性和发展动力。可以看到,两种视角均肯定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向市场、向资本的开放趋势,但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其实体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特殊的“双重属性”论争,即市场性和社区性如何协调的问题,双重属性分别对应经济发展功能和社区保障功能。有学者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当进一步发挥市场属性,增强发展职能,而适当保留社区性(田世野,李萍,2021);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其道义属性不可丢弃(郭占锋,蒋晓雨,2023)。事实上,经济性和社区性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从应然性的探讨转向实然性的思考,具体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以期联结“经济—社会”的属性,深度阐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深化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认识。笔者对浙江省G村开展了长达六年的跟踪调研,运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G村所在镇政府人员、G村“两委”成员、G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G村村民等集体经济发展参与主体进行调研,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嵌入性理论资源构建分析框架,剖析了G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嵌入性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关系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指出,经济制度是浸没于(submerged)普遍的宗

教、政治和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行动是制度化的社会过程(波兰尼,2007:40;2014:35-53)。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强调经济活动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Granovetter,1985)。后续的研究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对嵌入性分析进行了扩展,认为市场行为不仅仅受制于结构,更是特定制度、文化情境下的理性行为(Fligstein & Dauter,2007)。受到嵌入性概念的启示,许多中国学者将其用于分析乡村产业经营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例如,姚兆余和郝泽芸(2021)指出,农村产业发展不仅依靠结构性的制度和规范,更依靠乡土关系,因此需要重视乡村场域的特殊结构及其运行逻辑。农村产业的具体经营过程中,需要采取土客结合的用工模式(陈航英,2021)、“只可意会”的交往方式,理解乡村伦理传统的“社会底蕴”(杨善华,孙飞宇,2015)。对于本文所关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来说,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文化、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乡土社会是其发展壮大特殊社会结构,天然具有双重属性。需要注意的是,集体经济与乡村产业在主体上仍有不同之处,集体经济天然地被赋予了“经济—社会”双重属性,是以经济为载体实现对村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整合(潘璐,戴小燕,2023)。在推动集体经济向市场开放程度的同时提升集体统筹力量,需要回到集体经济的双重属性,细致地考察乡土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多重联结机制。

从集体经济的社区性来看,其发展和改革过程并不生成于一个制度设计或市场运行的真空,集体经济在乡土社会场域中具体运行,承担着将小农组织化的职能。此前,一些学者对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规模化、组织化的探讨就凸显了单一的市场治理机制会遭遇信任不足等困境。村庄场域显示了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和社会基础,如特色产业组织的运作和管理是关系网络和交往形态的结果,这得益于特殊主义伦理基础的规范作用和“将心比心”式的情感交换(付伟,2018)。从集体经济的市场性来看,纯粹以社会规范来治理经营显然难以有效激活村庄的发展动力和整合村庄内外资源,分散的小农经营主体不具备拓展市场、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由此可见,勾连集体经济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要构建与市场衔接的桥梁,另一方面要扎入乡土社会的场域,更需要以村干部为骨干的村集体组织的统合作用。

(二) 分析框架:多重嵌入性与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通过以上梳理分析可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嵌入市场环境、乡土社会及组织环境之中,多重嵌入性既构成了集体经济发展主体的行动框架,也提供了可供利用和动员的多样资源,形塑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赵晓峰,孔荣,2014;孙泉雄,2023)。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划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而祖克与迪马吉奥认为格兰诺维特的分析过于结构主义,忽视了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将“嵌入性”扩展为“制度嵌入性”“结构嵌入性”“文化嵌入性”与“认知嵌入性”(Zukin & Dimaggio,1990:979-996)。以此为基础,结合案例实际,本文认为可以从市场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三个维度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市场嵌入指的是集体经济组织

与市场间的衔接状况,衔接越紧密则市场嵌入越深。在本案例中,强村公司作为衔接集体和市场的中介组织具有探讨的现实意义^①,其建立过程反映了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断完善。关系嵌入指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与村民、乡贤、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关系,互动关系越好,关系嵌入越深,越利于关系向资本的转换。组织嵌入指的是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托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基层组织,实现对村民的动员和产业的统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多维的,在经济层面上实现村民和集体经济的共同增收,在社会层面上提升村庄的凝聚力和塑造村庄共同体,在政治层面上实现对村民的广泛动员和提升村集体自治能力。因而本文将多维发展目标融入对农村集体经济的考察,提出了多重嵌入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以期阐明集体经济“经济—社会”双重属性间的联结机制。通过对浙江省G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其如何通过多重嵌入性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探讨集体经济的嵌入性发展何以可能。

三、案例呈现:G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村庄概况

G村是位于浙江省东部象县西郊的一个传统村落,耕地面积1254亩,山林面积6500亩。从地理区位来看,村庄三面环山,仅有一条路借道邻村与镇里相连,交通十分闭塞。从村庄产业结构来看,少部分村民依靠传统种植业,多数村民在象县城区打工或在本地的工程队打零工增加收入。G村由于耕地面积极为有限,且被山林分割,十分分散,难以连片经营,缺乏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基础,村庄内也无工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山林出租,但收入微薄。20世纪90年代,该村属于贫弱村庄。尽管G村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人文底蕴,且村庄依山傍水,自然景观资源相当丰富,但村庄却一度靠砍伐古树、竹林提高村集体收入,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并且由于观念认识上的不足,家家户户将粪坑作为“家产”代代传递,使得村内污水横流,卫生条件极差。G村有674户,常住人口1500人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均收入仅有2000元左右,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就业,村庄空心化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G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和现实的紧迫性。

^① 强村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为目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等,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公司化运营兼顾社会效益的企业。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10部门关于促进强村公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网.(2023-06-21)[2023-07-25].http://nynct.zj.gov.cn/art/2023/6/21/art_1229235418_5128600.html。

(二) 发展历程

1. 启动:能人型村干部带头领办

G 村书记老欧当了近 40 年村支部书记,1986 年上任之初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修路和环境整治上。通过本村筹资、各家出工的方式修建进村公路,每家每户出资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按人头每人出工四天,进村公路历经四个月建设完成。借助 21 世纪初浙江省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契机,老欧带领村委会成员和党员带头清理河道、清除粪坑、植树造林,经过几年的环境整治,G 村的发展面貌得到改善。环境整治好以后,老欧和村委成员就想着怎么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契机源于村民会议中某位村民的提议,他提出:现在大部分村民外出打工,村里有很多闲置的宅基地,而且村里环境也还不错,能否考虑利用空闲的宅基地开农家乐。老欧当即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便带领村委会成员前往其他乡镇考察学习民宿经营,计划动员村民参与开办民宿。

2012 年,老欧带头并动员村里六户村民开办农家乐,并于当年国庆节正式营业。经历了经营初期的客源稀少、人才缺乏、资金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G 村的民宿产业客源逐渐稳定,也打出了地方知名度。这一阶段,尽管 G 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尚未成规模,但以个体化经营为主的农家乐为集体经济奠定了产业基础和提供了发展思路。

2. 发展:拓展多元化经营模式

随着民宿业逐渐步入正轨,老欧带领村委会成员开始探索多元化经营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依托旧村改造活动对本村闲置宅基地、旧厂房、旧校舍、办公用房进行二次开发,与本地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修建了村史馆、孝学馆、竹根雕展览馆,并将其纳入本村旅游路线。第二,以三产带动一产、二产发展,延长产业链条。G 村从 2017 年至 2020 年积极申请建设了天然游泳池、观赏栈道、七彩滑梯、亲子乐园等旅游项目,努力打造综合性的旅游服务。2019 年,村内开设了农家集市和 QQ 农场,将每周二、四固定为集市日,开展草莓、橘子等农作物采摘活动,丰富游客的田园体验。另外,G 村计划建设食品加工厂,以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鼓励并帮助村民进行农副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第三,G 村于 2013 年成立了村旅游服务部,统一管理村内旅游事宜。这是 G 村首次尝试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尽管此时旅游服务部仍是隶属于村经济合作社的服务部门,其工作人员主要由村委会成员担任,但这体现出村集体对集体经济进行专业化、市场化管理的初步构想。

这一阶段,G 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初具规模,不仅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自主经营民宿的收入,还拓展了多元化的途径增加集体经济收益,真正做到了村民富裕和村庄富裕共同推进。G 村还对集体经济的组织形态进行深入探索,为后续发展体制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3. 壮大：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形态

近年来“民宿+旅游”的产业模式在各地蓬勃发展,如何保持自我的竞争优势关系到G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象县自2020年起停止对中低端民宿的补贴,转而鼓励中高端民宿项目、历史特色民宿项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G村急需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升级本村的旅游产业。G村成立了以村支书为法人代表的旅游服务公司,统合旅游产业的升级工作,逐步形成“公司+村集体+村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该旅游服务公司是由G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全资投入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即股份经济合作社下属全资子公司,在公司化经营的同时保障了村集体资产不会流失。在乡镇、县两级政府的牵线搭桥下,G村引入了W民宿托管公司和中青旅两家公司,对村集体所有的部分房屋进行高端民宿升级,力图打造样板民宿、产生示范效应。旅游服务公司的成立在规范运作旅游项目、安排村内闲置劳动力就业及合理分配利益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每年必要的项目投入成本外,其余盈利主要用于村内公共设施建设、环境建设和提供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

在这个阶段,G村集体经济逐步建立起市场化、规范化的制度和村庄民宿产业的声誉,不仅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益,提升了村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探索出一条集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之路,实现了村庄的长期发展。

(三) 发展成果

纵观G村的发展历程,该村从远近闻名的贫弱村发展为“市级美丽乡村”“省级示范村庄”,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村民持续增收。民宿产业从2012年的7家发展到2023年的54家,床位达到1000多张,每张床位的年净收入超过1万元,民宿户均年收入达到20余万元。2020年村集体收入^①为262万元(见表1),2021年村庄旅游综合收入达5600余万元。G村的发展已经成为地方典型案例,体现出经营方式多样、经济性和社会性并重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特点(郭晓鸣,张耀文,2022)。

表1 2020年G村村集体收入

收入来源	具体项目	金额(万元)
农业用地对外承包	种植柑橘	16
	露天游泳池	10.4
农村建设用地经营	大礼堂承办喜宴	5
	烧烤基地	15.6
	民宿承包	15
民宿经营	管理费用	200
合计		262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对G村书记、G村所在镇财经所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

① 这里的村集体收入仅包含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而不包含上级财政的各项补贴、奖金等。

四、多重嵌入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

如前所述,农村集体经济并非在经济理性的真空中运行。从嵌入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依赖本地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关系资源,与村庄组织生态和社会关系也有复杂的关联。这就要求集体经济的组织形态、经营模式和业务关系与村庄的组织制度环境、社会关系网络相匹配。本文从市场嵌入、组织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维度,分析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

(一) 市场嵌入:创新经营主体

G 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包括上千亩雷竹基地、随处可见的古树木、穿村而过的大雷溪等自然景观,村庄还留存了清嘉庆年间建造的古桥、古道等历史遗迹,人文底蕴十分浓厚。村内有一饮用水水库,储水达 53 万立方米,周边被丰富的植被所覆盖,是天然“氧吧”。然而在民宿业发展之初,村内的旅游资源未被充分开发和整合,旅游的经营主体以村民个体为主,形成了以风景观光和体验农家生活为内容的“农家乐”发展模式。较为单一的旅游形态制约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内在地显示了地区旅游设施建设、服务内容、服务管理和产业要求的不匹配,这对旅游产业的市场化、制度化管理和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G 村于 2013 年成立了旅游服务部,这是一个下属于 G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产业服务部门,主要承担旅游服务咨询、纠纷调解和引入客源的工作,村集体聘请了专人负责。然而,由于旅游服务部在制度上缺乏市场化运作的合法性,其业务只限于一些公共服务而无法深入参与产业经营,且工作人员的外来身份使其在村内资源动员、人员调配乃至关系调解方面缺乏话语权。随着国家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股份)经济合作社取得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党的二十大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G 村于 2017 年将旅游服务部正式改名为旅游服务公司。旅游服务公司的经营利润需要上交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接受后者的管理,但在具体运作中,具有受公司法保障的独立经营的权利。为了保障村集体资产并利于村委的管理,旅游公司的法人由 G 村书记担任。旅游服务公司聘有一名旅游服务经理,由原旅游服务部经理担任,还聘有两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是 3 000 元/月。旅游公司成为联结村庄内外资源的“结构洞”,具有独立经营旅游项目、参与政府招标承接资源的合法性地位。G 村于 2018—2020 年间投资 170 万元建设了七彩滑道项目,投资 100 万元修建了环水库绿道,均由旅游公司牵头建设,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集体经济收入的再投入。

G 村旅游服务公司的成立,一方面是对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造,使村集体旅游产业的发展更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则和逻辑,不仅提高了村内旅游资源开发、整合的运作效率和水平,促使村内资源和村外资源得以顺利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

的开放性;另一方面,由村书记担任法人保障了市场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适应乡土社会的逻辑,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推动和村内关系的协调。同时,旅游公司受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管理,保障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根基。

(二)关系嵌入:动员社会资本

在村庄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乡土网络中的各种资源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而获取这些资源就需要采取符合乡土特点的行动策略。

1. 发展破冰:动员家族成员开办农家乐

在旅游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供需难以匹配是旅游产业面临的普遍困境。老欧谈起一开始发展时的困难是“两眼一抹黑”,他说“起初开办的七家民宿中,另外六家都是(我)要好的亲戚朋友,一开始他们也不怎么相信这开得起,都是我一家家去做思想工作动员来的”(G村书记,2020-10-04)。凭借对村书记的信任,G村的首批农家乐才得以顺利开张,然而开张以后客源又成了很大的问题。老欧通过自己多年村干部经历建立起的政缘关系,寻求其他乡镇书记帮助,“借”了一批客源来体验本村的农家乐,其后依靠亲戚关系介绍了一批客人。通过这两批游客的口碑传播和滚雪球式的介绍,该村旅游市场才逐渐打开。为了动员更多的村民回乡开办民宿,老欧一户户人家打电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予其开办民宿的信心和承诺。“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俩夫妻在城里面打工最多也就一年十几万,还要付房租水电,还不如回到村里来开农家乐,一年这些钱还是能赚回来的。村里相互之间客人都会有照顾,村委会也会帮忙”(G村民宿业主,2020-11-04)。

2. 资金开源:寻求政府项目资源支持

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修建停车场、凉亭等旅游业的配套设施和完善公共服务,老欧和村委会班子成员四处找关系、跑项目,通过到各级政府跑资源的方式获取资金支持。乡村社会中的项目运作是村委向上申请和政府向下推荐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强烈的人情色彩和“可操作”的空间(李祖佩,2016;姚兆余,郝泽芸,2021)。老欧和几位村委干部根据申请的项目,频繁拜访农业农村局、环保局、县委、县政府等有可能负责农村建设的单位,通过将项目内容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挂钩的方式获得政府关注。跟领导“要钱”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做水库的旅游开发建设,就想着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在水库周边搞一圈文明标志牌或者增加一些生育政策宣传,这就和县文明办、计生办的工作挂钩了”(G村村主任,2021-10-03)。可见,跑项目也需要符合政府的政治需求。既要和政府的发展目标一致,又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收益。G村的旅游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村庄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其发展模式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肯定,政府也更愿意把项目批给G村。

3. 情感联结:邀请乡贤建言献策

老欧和村主任于每年腊月廿七、廿八请村里的经济能人回村吃团圆饭,谈谈家乡

今年的项目建设情况并询问其关于发展的意见,在饭桌上实现了情感联络和资源动员。同时,通过乡贤理事会将各位经济能手再次纳入村庄场域,以乡土情谊激发其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和公共性(龚丽兰,郑永君,2019)。为了进一步强化旅游项目与村庄历史文化资源的结合,G村还邀请了村退休教师、手工艺能人和村大学生参与规划旅游路线、设计文创产品、编写村史,将G村的无形财产与有形资源相结合,丰富经济发展的内涵、促进文化的传播、增进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将村庄再次联结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

(三)组织嵌入:引领发展方向

农家乐发展初期以农户的个体化决策为主,然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一些难题。一是,同质化竞争严重,村里大部分农家乐都以提供农家生活体验为卖点,和其他村庄相比并无独特的优势;二是,游客的增加提高了村庄环境维护的成本和难度。这些难题需要借助集体的力量克服,需要加强村“两委”对产业发展的统筹作用。

1. 产业合理规划,打造旅游品牌

G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了解决旅游项目单一的问题,对村庄旅游产业进行了规划,确定了三个转变目标。第一,由单一的农家乐转变为旅游服务综合体,打造文旅融合的村庄品牌。村委会争取每年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并注重项目之间的配套性,比如投资100万元修建了环村观光步道以后,又投资50万元建设了观光花圃,实现了“步步有景”。第二,利用市场经营的思路打造不同的旅游板块,使各个板块形成综合效应,现在已有的板块包括由民宿、餐饮、观光农业、农家集市构成的民宿板块,以水库、环水库步道、水库烧烤基地为主的生态旅游板块,由儿童乐园、天然泳池、七彩滑道组成的休闲旅游板块以及由村史馆、竹根雕馆构成的文化板块。第三,积极参加评比,增加村庄知名度。G村先后申请并获得了“省级引领型农村社区”“全国文明村”等称号,被国家发改委收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名录,被各级政府重点宣传并相应地获得了地方财政的补贴和项目支持,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2. 提升服务品质,争取政策资源

在农家乐数量增多和中低端民宿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村支书老欧敏锐地感觉到了要培育高端民宿以提升产业竞争力。此时,各级政府也在调整对民宿的补助政策,2013年对床位的直接补贴转变为对民宿的分类奖励,2021年取消了对中低端民宿的奖补,加大对高端民宿的扶持力度,具体产业扶持政策见表2。为了提升全村民宿的标准,村委会定期召开民宿经营交流会,为村内开办民宿的家庭提供相互学习、沟通的平台和机会,帮助他们提升民宿服务品质和进行升级改造,使其符合各级政府产业扶持的补助规定。G村集体帮助该村的非遗传承人打造竹根雕非遗民宿,邀请了专业设计师对民宿进行改造,融入非遗的文化内涵,使该民宿一举成为全县的标

杆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表 2 各级政府对民宿产业的扶持政策(2017—2020 年)

政府级别	补助项目	补助要求	补助金额
市级	床位补贴	由行政村开发,床位超过 50 张	2 000 元/张
	等级民宿评定	白金级/金宿级/银宿级 经市旅游主管部门评定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
县级	星级民宿评定	3 星/4 星/5 星	10 万元/15 万元/20 万元
	旅游厕所	旅游 2A/3A 级	10 万元/15 万元
	非遗民宿	经县旅游主管部门认定	1 万元
	民宿特色村		5 万元
乡镇级	床位补贴		1 000 元/张

注:表中资料由笔者对象县旅游服务中心、象县农业农村局、G 村所在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及《象县民宿管理办法》整理而成。

3. 协调发展矛盾,平衡利益分配

开办民宿以后,难免存在部分游客违规采摘非民宿经营农户家农产品的不文明行为,不时有村民投诉农产品被偷或者田里的庄稼被毁坏,一度导致民宿业主与农户之间的关系紧张。后来,村委会鼓励村内开办民宿的家庭向村内农户采买新鲜蔬菜和一些农副产品,同时定时开办农村集市,提供农蔬采摘体验活动。如此一来,既可以调和村内开办民宿引起的获利不均的问题,又能够使村庄内部形成民宿业主和农户之间统一的利益纽带。

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嵌入式发展何以可能？

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实现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G 村的发展实践生动展现了该村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运用市场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三种方式,实现了 G 村的嵌入式和跨越式发展。那么,该村集体经济的嵌入式发展何以能够实现呢?下面从农民利益诉求、熟人社会的情谊和组织的权威性塑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基础:符合农民的利益诉求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普惠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是对上一阶段部分地区出现的集体经济脱离农民主体问题的反思和总结,也指明了集体经济需要以农民增收为基础,满足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与诉求。G 村集体经济之所以能持续壮大,原因在于 G 村的集体经济与每位村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且通过产业经营、项目承包、优先雇用等多种形式实现了利益联结。G 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初期,村民对农家乐经营的探索和实践就彰显了农民的发展意愿,G 村坚持发动农民主体自办民宿正

是考虑到了自主经营对农民的极大激励作用。

随着旅游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农民的分散经营逐渐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农民较为封闭的经济意识难以适应旅游市场的新需求,露营经济、网红民宿等现象的兴起显示出旅游消费端的升级,也相应地对旅游服务供给和旅游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当下乡村旅游市场日益饱和,同质化竞争严重,G村也面临客源流失的竞争压力,农民的经营收入受到影响。G村转向公司制的市场经营模式有利于解决农民持续增收的困境:一方面通过对接公司团建、康养休闲项目扩大团队客源;另一方面以现代化经营理念重塑民宿特色、加快民宿转型。另外,集体经济的市场化经营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G村每住宿一名客人,民宿业主需要上交旅游服务公司8元卫生管理费用,其中2元是旅游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的绩效,其余6元则是旅游服务公司的收入。这一笔收入主要用作村内卫生管理费用支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工资等,结余部分核算计入集体经济收入,2020年仅卫生管理费用一项就给集体经济增加了近50万元收入。G村将旅游服务公司的收入投入每年的项目建设,创造出大量工作岗位,优先安排村里的闲散劳力、困难群众就业,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生活,因而产业发展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二) 社会基础:家庭为本与熟人社会

费孝通(1985:40)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其中家庭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一种可扩展的事业组织。家庭不仅承担着生育的基本功能,还承担了生育以外的经济性的职责,这种被称为家庭经营的经济社会结构在乡村工业化的进程中依旧存续下来,延续了家本位的道德基础和伦理意涵,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肖瑛,2020;付伟,2021)。以G村为代表的村民自办民宿是新时代家庭经营的典型,换洗床单、做饭迎客、休闲娱乐等民宿业务往往需要三代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由于都是自家人,彼此的支持增加了经营的韧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帮助父母打理生意或表示以后会接手民宿经营。“爸妈开了民宿以后也总是让我们回去,考虑以后觉得也挺好的,回去可以跟一家人在一块,赚的也够养活自己。最重要的是爸妈年纪也大了,有时候他们俩加上我外婆也忙不过来,回去也能照顾他们”(G村村民,2021-10-04)。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发达地区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壮年流失的情况。但近年来,许多青年加入返乡创业队伍,这客观上源于城市就业压力的持续加大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发展机会,主观上亲情、孝道等伦理观念重新凝聚了家庭本位的共识,增加了返乡的吸引力(唐伟,2021;李斌,2023)。

乡土社会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血缘、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纽带,在伦理上、心理上将村民与村庄联系在一起,这为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调解提供了便利。G村现有民宿54家,在民宿产业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各家经营收入仍有一定差距。由于发展经验和水平参差,在菜品质量、客房整洁度、装修布局以及客户黏性等方面相差较

大,有的民宿客房供不应求,有的则客人寥寥。有民宿业主在村民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村内民宿业主建立了微信交流群,由老民宿业主带新民宿业主,客满的民宿会在群里招呼一声,将客人匀给客源较少的民宿。G村内“欧家大院”和“大盆院”两家民宿是市里的精品民宿,村书记就请两家的开办人现场给大家展示平时的配菜、如何在朋友圈吸引和维护客户,还让新开的民宿业主去参观两家的客房内陈设、物品的提供和摆放等。由此,G村的民宿业发展形成了某种隐形的共识,即每一家民宿发展起来才是真正的发展,老民宿业主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新进的民宿业主。

总之,乡土社会中存在着家庭为本的观念,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扩展到整个村庄,形成了村庄共同体的结构,这一结构表现为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蕴藏于其中的特殊主义信任关系和守望相助的情感,这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动力(韩庆龄,2023)。

(三)组织基础:基层治理权威的塑造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村庄治理的意蕴,一方面需要实现村庄内部资源的动员和整合,另一方面需要洞察外部市场的变化并对接市场资源,这涉及村民动员、村庄改造以及村庄经营的问题,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曹聪敏,赵晓峰,2023)。一是,群众动员关系到利益诉求,政府的外来身份往往难以赢得村民的信任;二是,村庄的经营项目众多,包括旅游项目打造、配套设施建设,政府不宜直接从事市场经营活动,这给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组织的嵌入提供了制度空间。与此同时,像G村书记老欧这样的村庄能人进入基层治理体系,成为村庄的领导核心,具有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宗族精英三重身份,这使得老欧在村庄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促进村庄产业发展。老欧是第一批开办农家乐的人,起到了示范带头的作用,增强了大家开办民宿的信心;近40年的村书记身份使他积累了深厚的政缘关系网络资源,具备拉资源跑项目的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与地缘联系赋予了老欧在乡村社会中的“自己人”身份,给予了其办事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日益增长,老欧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巩固,确立了村治核心的位置。可以说,其权威的生成既基于其个人魅力,又符合基层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国家法律法规,兼有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的特点,这使得以村书记为领导的村“两委”组织在日益丰富的资源流动空间中得以统筹集体经济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能人治村固然可以发挥其优势,但也可能存在过度依赖个人资本、私人控制公共资源、精英之间结成联盟等问题,进而对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齐晓瑾等,2006;卢福营,2011;桂华,2020)。G村效仿其他村庄的经验建立了每月一议的“村民说事”制度,将村民真正纳入村庄治理场域中监督权力的运行,这一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并激活了村庄的规则意识。G村还建立了村干部“夜办公”制度,每晚18:30是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办公时间,大家集中在村委

会就民宿升级、旅游项目开发、停车场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进度都将在“村民说事”会议上向村民代表们公开。村“两委”班子的付出以及工作的成果被村民们看在眼里,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认可。

六、结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集体经济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而是嵌入在多重社会结构之中。市场结构、乡土结构、组织结构都深刻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实践。从 G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来看,首先,集体经济发展嵌入在市场环境中,遵循市场运作的逻辑,G 村探索建立了公司制的治理结构,使得资金运作、利益分配、项目建设等呈现出经济理性的特征,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集体经济发展嵌入在乡土社会中,信任、人情、关系等社会资本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凝聚村庄共识的作用,弥补了市场逻辑的局限性。最后,集体经济发展要求村集体发挥统筹作用,村“两委”在产业发展中承担了多种职能,不仅牵头利用了市场化的经营手段来发展集体经济,推进民宿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拓展了多种关系资源,协调了利益分配不均问题。

G 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嵌入式发展,与村庄的社会基础存在内在关联。首先,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是嵌入性发展的经济基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农民开展经济活动的基本利益诉求,G 村以农民自主经营为基础建立了“公司+村集体+村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将农民利益与村庄利益进行深度捆绑,实现了共同发展,不仅切实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增加了村庄的社会利益。其次,家庭经营的精神动力和熟人社会结构是嵌入性发展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层面来看,乡土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千百年来村庄内部的互助观念、同乡情谊以及对村庄的归属感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依旧存留,这成为村庄共同克服困难的社會基础。最后,基层治理权威的确立是嵌入性发展的组织基础。当下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下,加强“统”的能力,这也是从传统的集体经济向新型集体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集体领导队伍,如同发展的“主心骨”把握发展方向,探索发展路径,同时市场化进程中兼具资源动员、资源整合的能力。

尽管本文研究的案例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比如村书记在村庄内极高的个人威信、较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本文对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嵌入性机制的分析,仍具有可讨论的学术价值。特别是 G 村的发展历程和路径探索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空心化严重的村庄而言具有启示意义,即因地制宜挖掘村庄发展的各类资源,特别是以村集体为核心凝聚村庄力量,培育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确立以村“两委”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主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股份制)

经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经营等依赖于村集体的经营能力和统筹能力(马良灿,李净净,2022),因而一方面要继续给予村“两委”在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合法性,明晰村“两委”的发展权责;另一方面要培育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意识和管理意识。集体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呼吁一种“政经分离”的治理结构,但现阶段一些地区尚处于摸索和起步阶段,需要村“两委”的引领和支持;况且,“政经分离”不意味着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机制来规范发展(桂华,2019;张新文,杜永康,2023)。第二,要重视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重嵌入性,尤其是社区属性与市场属性的联结。如前文所述,集体经济不是在市场的真空中,而是处在一定的关系网络和组织制度环境之下,对关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发展效率。因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要注重对非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理顺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第三,要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多样化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沈迁,2021;韩旭东等,2023),这一方面要保障农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农民的利益诉求为发展的目标和前提开展经营;另一方面要发挥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本地的经营领域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波兰尼,2014.经济——有制度的过程//格兰诺维特,斯威德伯格,编著.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瞿铁鹏,姜志辉,译.瞿铁鹏,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 曹聪敏,赵晓峰,2023.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45
- 陈航英,2021.土客结合:资本下乡的用工机制研究.社会(4):69-95
-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付伟,2018.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6):71-90
- 付伟,2021.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4):146-165
- 龚丽兰,郑永君,2019.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中国农村观察(6):59-76
- 桂华,2019.产权秩序与农村基层治理:类型与比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分析.开放时代(2):36-52
- 桂华,2020.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能人治村——动力、过程与后果.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72-77
- 郭晓鸣,张耀文,202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领域拓展及动能强化.经济纵横(4):87-95
- 郭占锋,蒋晓雨,2023.道义经济:村庄共同富裕的实践表达——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中国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90-104

韩庆龄,2023.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机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4-102

韩旭东,李德阳,郑风田,2023.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2-61

江宇,2022.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烟台实践”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126-132

李斌,202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 S 村的调查. 探索(2):141-151

李祖佩,2016.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社会(3):167-191

卢福营,2011.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学术月刊(10):23-29

马良灿,李净净,2022. 从利益联结到社会整合——乡村建设的烟台经验及其在地化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1-104

潘璐,戴小燕,2023.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困境与现实悖论.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9-54

齐晓瑾,蔡澍,傅春晖,2006. 从征地过程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以华东、华中三个村庄的征地事件为例. 社会(2):115-135

沈迁,2021. 村社统筹合作社的嵌入过程、社区基础与治理机制. 北京社会科学(9):111-120

孙泉雄,2023. 经营性治理: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一个新视角. 经济学家(4):108-118

唐伟,2021. 科技下乡的社会基础——以 Y 省 J 村柑橘品种改造过程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4-84

田世野,李萍,202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规律: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社会科学研究(3):51-58

王德刚,孙平,2021. 农民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模式研究——基于乡村旅游典型案例的剖析.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42-151

王阳,吴蓉,2021. 明星村的烦恼:乡村集体经济的权威型发展及其困境——基于东部 A 村发展经验的反思.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32-140

夏柱智,202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点.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2-30

肖瑛,2020. “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11):172-191

杨力超,张冠李,2023. 乡村产业兴旺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发展路径——基于贵州省黔县的调研与分析. 贵州社会科学(2):154-160

杨善华,孙飞宇,2015.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社会(1):74-91

姚兆余,郝泽芸,2021. 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策略和逻辑——以甘肃陇中地区 B 合作社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64-172

曾恒源,高强,202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三重困境与破解路径: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 经济学家(7):118-128

张绘,李尚,2023. “未来乡村”共建共享平台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浙江温州的调研. 地方财政研究(2):92-98

张克俊,付宗平,202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阐释、实践模式与思考建议. 东岳论丛(10):105-114

张新文,杜永康,2023.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3-33

赵晓峰,孔荣,2014.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嵌入式发展及其超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2-52

周立,奚云霄,马荟,等,2021.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1-111

Fligstein, Neil, Luke Dauter, 2007.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105-128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 481-510

Zukin, Sharon, Paul Dimaggio, 1990.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actical Mechanism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A Case Study Based on Village G in Zhejiang Province

CHEN Lei YAO Zhaoyu

Abstract Developing a new typ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epen rural reform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the experience of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Village G of X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and foundation of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is vill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llective economy of village G was subject to the embedding effect of triple structural forces, i. e., a corporate market oper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market embedding; the power of social capital was stimulated in the form of 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tatus of village collective coordin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embedded development is attributed to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business model,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authority effec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refore, developing a new typ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quires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tensions inherent in the “market-community” dual attribute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linkage mechanisms.

Keywords Embeddednes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actice mechanism; Community base